引论

一、写作方法和视野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把百年中国人具体化为可具体分析的群体。群体的分类有不少分法。本书采用了职业分类方法，分为农民、工人、商人、知识分子四群体。而代表四群体及全民族根本利益的群体是政党，干部则是执行政党意志及作用的群体。100 年来，中国人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干部的前仆后继，为国为民献身，则不可能有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实力。政党和干部群体的特殊重要性，贯彻于全书的写作中，然而，正是它的特殊重要性，使我们常常在写作中埋些伏笔，以便留待以后集中研究，而以四群体为直接写作对象。二是考虑如何把写作建立在有据可循的资料基础上。本书采用了以百年报纸媒体检索资料为依据，进行检索、整理和分析。前 50 年所依据的主要是《申报》、《晨报》和《民国日报》后 50 年是《人民日报》。对前 50 年的检索方法主要是翻阅、摘录或复印、整理和分类。后 50 年主要参考《人民日报》报道。首先开启《人民日报》光盘索引（1949—1995 年），分别打入主题词工人、农民、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把所得数据输出，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分类并作统计分析，将有关数据（频率）作出曲线图。1995 年以后数据由于尚不见光盘有之，便从互联网查得；也是分别打入主题词获得。其中光盘检索缺少 1963 年至 1965 年的数据，这样就到图书馆进行手工报纸检索。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收集方法工作量大，花费时间长，内容庞杂。另外在主题检索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仅仅从以上几个主题词检索，也许不能包含全部有关本书所涉四个群体的内容，而且，在整理和分类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人工操作，一张一页地查阅，这种状况下也可能会有误差。但是，我们认为，这样检索仍然是有代表性和有意义的。整理分类后的一组组数据资料实际上是媒体给我们提供出来的一组组事件，同时这些数据也能体现本书所涉四个群体的基本活动特征。

采用这种方法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报纸媒体直接反映出本书所涉四个群体的历史地位、作用、角色面貌，或者说报纸媒体可以把我们带入一组组事件，使我们可以比较直观地思考分析和研究中国人是怎样走过刚刚过去的 100 年的。

《中国人百年——人格力量何在》的写作，以 20 世纪 100 年的中国农民、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被新闻媒介关注及报道的“事件”为依据，看这四个群体的历史位置和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而不是写他们的历史，或者说不是对他们 100 年历史的陈述，相反，是把四个群体放在历史事件中去考量。这样一来，写作所看重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与人，是历史事件在民众层得以维持的角色基础及其心理力量。参加本书写作的每位作者，不论年龄、阅历有多少不同，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些事件。当我们带着对历史事件的“同情理解”，设身处地地思考，“用心领悟”，一幕幕“话剧”就呈现出来了，于是“历史事件”是活的，有魂的，有涵义的。由此，如果把写作思路表达得具体些的话，就是在看四群体的历史位置和他们怎样走过 100 年的时候，着重看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行为及其心理特点，寻求他们 100 年历程的精神力量，就像书的副标题所设定的那样：人格力量何在。由此，收入写作视野的，是

三个相关的因素，即：历史事件⟺角色⟺心理（人格）。

从对四群体 100 年的写作看，前 50 年报纸媒体中的“事件”参数很少，基本上是引用历史文献等资料。后 50 年的《人民日报》光盘检索资料比较完整，但是 60 年代初期的光盘数据有所缺损，后来作了一些补充，仍有不足。不过，这不影响资料的质量，根据已有资料，提取的“事件”是可用的。在四群体角色和心理（人格）的写作方面，虽然每位作者各有风格，但，都着力突现角色行为和群体心理（人格）特征，并把人的行为和心理（人格）融会在事件之中。

二、人格力量何在

本书的副题是“人格力量何在”，包含了双重意思，一是人格力量的根本作用在何处，二是人格力量的根本作用为何者。人格是个体意义上的概念，又是群体意义上的概念。本书是在群体意义上使用人格概念的，即中国工人人格、农民人格、商人人格、知识分子人格。人格带有结构特性，是心理要素的组合状态。人格力量是心理力的组合，支配着角色行为；它的作用随同人的各种活动表现出来。本书写作中的“人格力量何在”，是在人的生存及发展这一根本点上提出的论题，即从人的根本活动看中国人在 20 世纪的 100 年尤其后 50 年的精神特点。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恰好在 20 世纪中叶，标志着中国社会质的飞跃和巨大变迁，从而，使我们的思考和写作也就沿着前后 50 年的不同历程去寻求中国人的人格力量。这个寻求，让我们领悟到贯彻 100 年的中国人人格力量是在他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所从事的那份劳动和职业活动即角色扮演中。当他们一旦失去了与其劳动和职业活动相联系的“资本”或“资源”，便在根本上失掉了角色资格，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而一旦掌握了得以劳动和职业活动的那些“东西”，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勇气、有能力的劳动者和职业者，一个有角色资格的人。

前 50 年里，从生产资料所有的社会配置状况看，中国的农民、工人劳动者，在总体上都是以他们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根本特征，他们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从 20 年代后几年开始，“苏区”和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实行土地革命，城市罢工运动，就其经济实质是为了解决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确立，保证了农民土地所有；工人当家做主，是工厂生产资料的主人；工业生产资料为公有制，归工人阶级所有，不再存在工人阶级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问题了。工人和农民，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生产积极性和学文化、办学校的热情空前高涨，工人、农民对领袖毛泽东都怀有深深的热爱和感激。到了 50 年代中期，1956 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主宰着工人和农民的头脑及行动，其结果，一方面由于激发工农的政治热情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满腔热情的生产行为逐步政治化，强化了工农与工商业者的对立观念。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工人和农民都是最有力的发言者，报纸上刊登的“工人说话了”的文章，是对“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最强硬定论。“反右”斗争又强化了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冲击意识。 1958 年“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高高举起，同样激发和提升了工人和农民为主力军的“凌云壮志”，而在实际

上产生了以不讲科学、破坏生产力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其后，1963年至1965年是一个生产恢复时期。到了60年代中期，则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走资派”，批斗“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上下陷入混乱。在这些“事件”中，工人和农民都没有立足在以提高生产力为基准的经济活动中，他们疏远了机器，远离了土地，更漠视了自己技术技能的提高，从角色扮演的角度看，规定他们角色扮演的那个社会期望是政治斗争，他们的角色被赋予了严峻的斗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工人和农民都没有完全成为与其劳动密切结合、创造价值的职业角色。

商人群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作为“资本家”被改造，“重新做人”，而不再冠以“资”字，商人不复存在了。原来冠以“资”字头的工商业被纳入国有企业。从检索资料看，商人空白长达20多年，在这个时间里，商人是彻底地失去了劳动或职业活动“资本”或资源的群体。

知识分子以其专业为谋生之职。在前50年，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基本上伴随着民族兴亡的社会使命和文化关切展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之间有争论也有共同关怀。他们可以是一贫如洗，或者两袖清风而不染，却不可以没有独立和自由，为了独立而自由地扬起救国旗帜，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知识分子职业大流动——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踏进解放区。后50年里，知识群体首先迎来的历史课题，是改造脑筋，清洗崇美思想，与此同时，是50年代初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强有力地促使着知识分子努力改造自己，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的命运基本上都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

起，“夹着尾巴做人”，紧跟着政治斗争节拍走路，却动辄“跷跷尾巴”，发表议论，评判时局，表现一下“忧国忧民”。但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与其专业融为一体，依其专业去创造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诚然，知识分子在政治斗争频繁的年代和斗争过后的相对稳定年代，都有过辉煌的业绩，但在总体上知识分子与其专业的结合是空泛的。

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革及发展，才使四群体与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或职业活动的结合变成可能的和真实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才有可能把人们的角色行为安置在“经济”这块根基上，才有可能在实际上按照首先摆脱贫困、然后发展的生存逻辑去扮演角色。讲经济，就要讲效率和效益，讲市场，讲竞争和能力，讲科学技术，人自身的素质问题也就被重视了起来。

农民以种田为本，根系于土地，调动农民积极性首先在种田上。土地承包和责任制，从制度上把土地还给了农民去使用、去管理。尽管许多农民进城了，农民不愿意种田了，然而，城乡关系调整、科学技术和信息传播向乡村倾斜等社会支持的结果，农民会以更大的热情回到黄土地，回到最有社会安全感的地方。工人碰到了下岗失业的境遇。客观地说，很多情况下，工厂或企业的领导集团应对下岗失业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工厂或企业没有搞好，主要地甚至基本上是领导集团自身的原因。就企业改革而言，下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策。在这个前提下，下岗失业者有个社会适应的过程，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关照下，下岗失业者的社会适应状况，与他们资源所有和对未来预期的状况有密切关系。下岗失业者的年龄、性别、婚姻、家庭等因素是不可控的，但资源所有和对未来预期的心理、观念因素是可控的，因而是可变的。走出困境是艰难的，

走出一步就是进步。不论下岗的还是在岗的，势在必行的企业改革，都将迫使人们不断努力增加资源所有。人们都面临着被选择、被淘汰的形势。这正是改革之后，在人们与其劳动或职业活动关系上形成的新的结合方式。这种新的结合方式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同时就是中国包括工、农、商、知在内全体劳动者、职业者的知识、能力和业绩比较好的时候，人们会在一个比较公平的平台上公平竞争。

在本书写作中，商人群体是个宽泛而又特定的概念，它包括了 1956 年被改造的工商业者，也包括了 80 年代社会改革之后形成的工商企业主、“下海”经商和留学回国经商的知识分子以及被称之为“企业家”的一层人等等。这种包括甚广的商人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有的职业分化及职业重组现象。关于企业家的成长及发展，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 1993 年至 1998 年连续 6 次调查[①]，表明企业家的地位、作用和问题，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极大关注。现代的企业家阶层，目前尚未形成，但他们的能力、他们所代表的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他们的作用和角色前途等等，已足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经营管理与“资本”所有的关系问题，将是制约中国企业家角色扮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知识分子也只有在 80 年代之后，才有可能将自己与专业真正结合起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它的“安身立命”之地，是在其专业活动当中。“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之本，这是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区别于农民、工人和商人的根本之点。

①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编著：《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与发展 1993—1998 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它的劳动和职业不是附着于土地、机器和企业“资本”，而是附着于知识的累积、再生、传播及应用，是知识“本性”的展现和增值，是知识体系的内在过程。知识分子的劳动和职业附着于“知识”，意味着职业上的独立运作和自由创见，意味着知识向“财富”创生的自然倾斜。从这一点看，我国知识分子的目前状态，尚需更多的“知识”、更合理的知识结构，尚需进一步的专业职业化。目前，多数知识分子资源不足，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多，他们疲于奔命的是收入、经费、机会以及为此所付出的“靠近权势、做关系”的代价。好在，情况在改变，可选择的机会在增多。什么时候到了知识分子像成功的企业家那样既握有“资本”，又依据经济规律，自主地寻找市场和机会，创造财富，既有较充足的资源又有对社会发展需要及其趋势的理解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时候，大概才可以说知识分子的专业职业化和“安身立命”才带有真实的意味。

以上的说法，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在 20 世纪的 100 年尤其后 50 年的人格力量在何处。人格力量本于人的心理活动，但它的作用力只有体现在人的劳动或职业活动中，才能得到最有创造性、最充分的发挥，它伴随着职业角色的全部扮演过程。

20世纪 100 年的中国，多灾多难的时候太多。以职业角色而言之，多灾多难即是职业角色遭到破坏，角色扮演受挫。这种情况下更令我们去思考：中国人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气质支配下走过来的？这是书中提出的人格力量的另一种涵义，即这里涉及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本书的“中华文化精神”部分，力图论述中庸气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中庸人格是核心人格，并用了较多笔墨分析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何保全自己，保全民族不灭“种”；贯彻“文化大革命”

10年始与终的精神气质，在其核心处就是中庸气质。为了论述这一点，把“文化大革命”事件的基本特点，表征为“文革断裂”，包括秩序性断裂、结构·角色性断裂和精神性断裂，这种断裂带来了社会表层和社会底层的分离。但在“断裂”处仍有中国人的“精神”存在，这就是人们用以适应“断裂”的中庸精神。人们每天出没于社会表层和社会底层，在表层的公共场所“革命”，在底层的家庭场所“保全”。“文化大革命”的10年对于人生并不短暂，包括当时的红卫兵在内，10年的磨炼，考验了中国人的精神寿命，验证了“中庸”的精神弹性和人格韧性。在这一部分，当讲到我国社会改革之前四群体职业角色与人的某种分离这一步，就自然碰到了人们在这种分离中的行为选择和适应的问题。从行为表现和适应方式看，会有各式各样，也千变万化，但贯彻其中的仍然是中庸精神。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被改造的“资本家”，就像当时报纸上批评他们的那样，“白天上街敲锣打鼓，晚上回家哭泣流泪”。这种状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表现酷似。1948年开始的东北地区大规模土地改革，农民斗地主曾有“扫地出门”的激烈形式，同时又出现了“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说法流传广布。这种不相称的表现，在实际上，是为缓和、均衡两极之间关系“留有余地”。80年代开始的“下海”风潮中，知识分子的家庭出现了一家“两制”现象，夫妻双方，如果一方“下海”经商，另一方则留在国有单位，这在当时，被评价为“社会保险系数”最大的一种选择。显然，人们在作这种选择时，并不会意识到，是在遵循中庸之道，而是沿着“留有余地”的生活惯性，自然形成。当时，“下海”，即是施展才华、发挥潜力改变贫困地位的机会，又是跳进了陌生的、无底的“海”，心中无数，择之必也“留有余地”。

“中庸”这东西，从文化上看是一种精神气质，从人格上看是一种人格特质；从中庸同其他范畴的构成关系看，它是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人格构成的基质即前面讲的基础人格和基础人格的核心。在“引论”部分要强调的是“中庸”之选择和适应的功能。由于世间事物都有两极，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优秀与剥落，廉洁与腐败，坦荡与诡秘等，可统称为正面和负面，因此“中庸”式选择和适应是“难能”。如果“义”和“利”，二者中任何一者不加“节制”，不予“中节”地介入这个选择和适应过程，就会产生出真伪颠倒、美丑颠倒及谬误和不公平。正是“中庸”之“难能”，中国文化讲究“做人”，讲究“人生艺术”。从人的社会化角度，可以说中国人的智慧、才华、灵活性，以及心机、算计、猜忌、察色等等，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庸”氛围中得到训化，接受文化遗传。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国人的富有和能力，一旦达到哪怕是中上乘水准，更不用说是上乘，就标志着文化和人格的现代化适应性甚高。因为在国强、民富背后，是众多的中国人职业角色的成熟，是文化精神和人格力量对角色的积极支配。

三、四群体“频率”曲线解释（后 50 年）

下面是 1949 年以后四群体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率图，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曲线图对四群体作比较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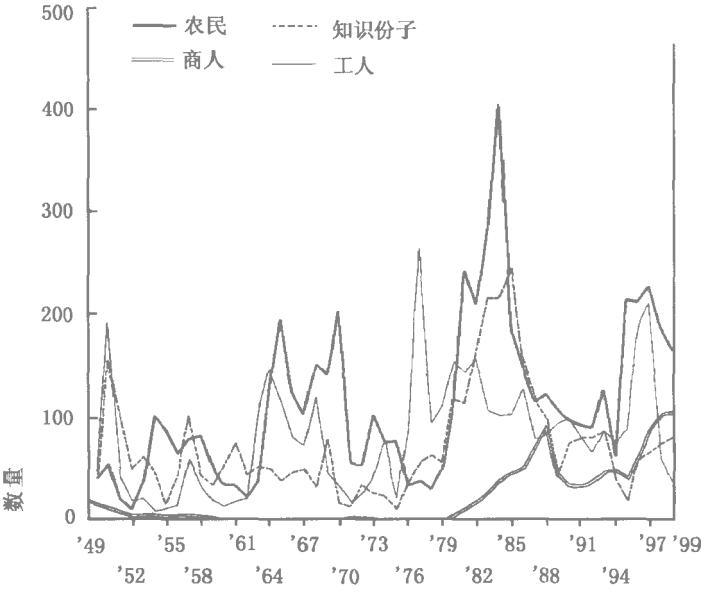
由图可见，建国初期有关工人的报道是最多的。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工人们的劳动热情，工人们纷纷被组织起来，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农民也是一样，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热火朝天地搞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建设、农村

基本建设和交公粮。这一时期给工人、农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解放感觉，工人、农民挺起了腰板，所以他们干劲十足，其中带着较强烈的感恩情感。相对来讲，知识分子虽然也有许多报道，但是其中多半是报道要如何加强和搞好对旧的教学内容的改造和使用，更主要的是做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因为工人农民干部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感到需要文化知识和技术知识，他们要获得知识就要学习并培养工人阶级知识人。商人报道是最少的，既使有一点也是说不法商人如何蒙骗顾客或制造伪劣商品。可以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分层秩序仍然存在。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和商人是被改造的对象，但是社会又离不开他们。其实工人和农民本身对知识是渴望的，甚至是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文化知识。

到了 1956 年，商人在媒体上就没有什么报道了，直到 1976 年以后才重新出现。我们知道，在 1956 年工商业改造后，中国就没有什么商人了。紧接着 1957 年“反右”，对知识分子改造随着对“右派”的反击和批判出现了高潮；而此时的工人和农民积极地参与了当时的“反右”斗争。 1958 年大跃进，工人和农民们的热情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好像凭着不足够的经验和土办法就能把工业生产水平搞上去，用口号就能把庄稼从地里喊出来。 1960 年至 1962 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人们的冲天热情开始冷却，土地的荒芜和工厂的混乱渐渐地使人们认识到，不讲究科学和质量，光凭热情和体力是不行的。从曲线图上可以看到，大跃进后的 1961 年左右，知识分子的曲线有个高峰，表明人们对文化知识和技术知识还是重视，有知识和技术的人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在广大的农村和工厂开展起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四群体《人民日报》报道频率曲线图（1949—1999）



1967 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曲线图中看到工人和农民的曲线较高；知识分子曲线极低。其中的内容多半是说，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工人农民积极地参加大批判，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最后进驻上层建筑领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978 年提出改革开放方针，商人的曲线冒了出来，首先只是个体户的报道较多，后来是个体经营者，到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或企业家，还有儒商等。虽然商人的曲线并不是最高，但

是可以看出，1979 年以后，只有商人的曲线攀升，而且到 1999 年也是上升的趋势；而其他三个群体 1999 年都有下降的情况。虽然知识分子在 1998 年、1999 年也有上升的势头，但是不如商人线高。农民在 1979 年以后是最高的，频率达 404 次报道。当时改革开放，是农民最先开始的，联产承包制和其他农村改革使农业发展起来。工人的曲线也是较高的，但是进入 90 年代后工人的曲线出现低谷，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后，农村景气了，但是工厂尤其是国营企业不能适时搞活，旧的体制原因和其他因素，使多数国营工厂整顿、停顿，或称“关停并转”。工厂的工人被分流下岗。1999 年《人民日报》有关工人标题的报道只有 15 条，其中的内容多是下岗职工如何自立更生，还有的是社会如何为下岗职工创造就业机会等。

从另一个视角，当我们稍加仔细地全视上面的曲线图时，会发现农民的曲线峰值几度都是最高，他们的行为一直为全社会关注。1954 年的峰值达 100，1965 年峰值为 195，1970 年为 202，1981 年 242，1984 年为最高峰 404，这个频率也是全图最高峰，接下来是一个大的低谷，其实这个低谷的峰值与其他三个群体比也是最高的，到 1995 年峰值又上升为 213，1997 年还是居四群体最高，为 227，由此直到 20 世纪末出现频率有些下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农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1954 年的峰值说明了农村热火朝天的互助合作化运动，踊跃种植和上交粮棉，为城镇居民的口粮问题和中国新兴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4 年的峰值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先是中国的农民迈出了体制改革的第一步，重新确定农民与他们所耕耘的土地的关系。至此中国农村沸腾起来，由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实质性的进展。1997 年的峰值

表明了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看到了农村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链接关系。当时，脱贫和扶贫受到重视，全社会都在关注农民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部分地区农民的富裕被看成是全国农民发达起来，但是，农民的负担加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农民脱贫致富。1997 年以后的曲线下降，应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从曲线图的横向看，工人的峰值曲线几乎与农民的同步，只不过没有农民的那么高，但却比另两个群体要高。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 年），这一时期工人的曲线峰值是最高的，为 191。工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扬眉吐气，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1968 年的峰值为 119，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医院和科研机构等，此时，中国工人群体是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1977 年的峰值 264 说明了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工业调整、整顿，恢复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景象。而 1996 年的 186 和 1997 年的 211 峰值，暗示着国有企业的运行状况不佳，出现优化组合、下岗分流，社会保障问题突出出来。这两个较高的峰值并不是乐观的象征，而是比较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其中多半报道的是下岗工人的境况。而且到了 1998 和 1999 年，工人的曲线直下，媒体上有关工人的报道明显减少了，这应该引起注意。似乎工人的社会功能并不像以往那么强势了。这是一种误解。在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工人农民这两个群体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力量，离开他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缺少了发展的根基。

知识分子的曲线在 1976 年以前一直处于低峰值，在这一时期即使稍有高峰也是负面的报道。比如在解放初期，有一个高峰值——1950 年的 156，但是，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

是工人农民需要学习文化知识和技术，其中的内容多是知识分子中的教师在传授文化知识和技术上如何开讲有关课程；另一个是知识分子接受工人农民的改造，接受社会的改造。而后者在其中占多数。1957 年的高峰值 101，就是充分说明。接着就是 1969 年的峰值为 79 此时，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知识分子从事工作的机构，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所以出现频率较高。知识分子曲线真正的高峰是从 1979、1980 年起，到 1985 年为最高峰 244。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新时期或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右派平反等，使社会尊重知识。比如陈景润和蒋筑英等知识分子楷模的宣传。1986、1989 年出现低谷曲线，到 1996、1997 又开始上扬，直到今日仍然呈上升趋势，尽管并不高攀。这说明了人们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和人的发展中知识的力量；而且国家制定了科教为治国之本的政策，也显示了对知识分子的看重，尽管对科教的投入还不足。

商人的曲线比较清晰，从解放初期到 1978、1979 年这一段几乎未见商人的报道，即便解放初期有些，也只是报道不法商人的不正当活动。改革开放后，最先出现的是个体户，然后是私营业主，再就是乡镇企业的经理或厂长等。 1988 年是其较高峰值 90，这时的检索主题词多出现的是“企业家”，当然也有商人或经商的主题词。人们对企业领导向企业家转变重视；对企业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并且曲线呈持续上升趋势，1997、1998、1999 年三年攀升，这一时期，社会对经商、商人和企业家与以往比，是刮目相看，人们对商人的社会价值有了比较充分、比较恰当的认识和评价。

综上所述，四群体在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但是其中不难看出，在以往不同时期他们各自的职业

角色并不恰当到位。从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工人农民出现较高峰值时，知识分子和商人则呈低峰值；而当知识分子和商人出现高峰值时，工人和农民却显示低谷。这说明了四群体各自社会功能的整合并不协调，其合力没有发挥出来。这里我们不妨假设，正常社会发展中，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各自功能角色成一致，其功能曲线同步变化，即便不能是理想化的同起同落、交替有序，但也应展示“异曲同工”的图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规定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阶级和主导力量；农民群体是工人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是最有知识和文化素质的智力部队；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支重要经营力量。

中华文化精神

写 100 年中国人，不能不涉及文化精神，就是说，在 100 年的各种事件中，中国人的表现有没有一种根本文化上的精神贯彻始终，并成为推动中国人 100 年来从落后、黑暗、贫穷逐渐走向独立、振兴、发展的深层精神力量。如果说有，那么这种根本精神是什么？这一点，几乎是所有研究中国人的中外学者所关心和涉猎的问题。《外国人看中国人 100 年》书中收集的外国学者著作都在实际上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资料，表达了对中国人文化精神的看法。墨子刻在《摆脱困境》书中提出的看法，可以说是现代汉学家观点中很具影响力的一种。

本书论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是从墨子刻的观点说起的。

一、方法论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把中国文化精神作为一个话题提出来，去专心思索和研究，必定涉及到一些现代海外学者和汉学家。本书看重中国文化精神研究的方法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很有意义，而且因为汉学家墨子刻（T·A·Metzger）在此点上见解独到。墨子刻在他那本有影响力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